

中国传媒前沿观察

ZHONGGUO CHUANMEI QIANYANGUANCHА

王云鹏 张君昌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传媒前沿观察

ZHONGGUOCHUANMEIQIANYANGUANCHА

王云鹏 张君昌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媒前沿观察 / 王云鹏, 张君昌主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78-3246-4

I. ①中…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2151号

中国传媒前沿观察

主 编	王云鹏 张君昌
责任编辑	张 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网 址	邮编: 100866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46-4 / G · 1412
定 价	39.80 元

永远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代序）

刘习良

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到2013年6月1日第四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已走过整整五个年头。五年来，在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以下简称中广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学术委员会以《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学术委员会工作章程》和《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2008~2012年学术理论研究规划》为依据，主要完成了课题研究、学术成果评选、广播电视台理论人才评选、学术研究基地建设、专项学术活动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六方面的工作。

一、课题研究

《2008~2012年学术理论研究规划》从应用学科、基础学科、新媒体新技术以及决策管理四个方面开列了45个重点课题。经过各方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90%以上的课题。另外，还完成了一些补充课题。

其中，共有四项长线课题，简称“两史”、“两学”。

关于“两史”。《中国广播电视台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于2009年正式启动。原计划三年内完成。在编写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各地、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存在很大差异，有详有简，还有的地方和部门至今没有提供任何材料。目前，三个小组只能根据拿到的材料编写书稿。2013年5月3日，《编年史》主编杨波同志召开了工作会议，三个小组汇报了编写工作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难题。就普遍存在的问题，会议作出若干规定。估计到今年年底各组可以提交全部书稿，供审稿使用。

2010年年初，决定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台改革发展十年回眸（2001年~2010年）》。9月，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重大理论研究项目立项。为此，学术委员会聘请了30位专家撰写了“绪论”加十章，共计40万字，已于2012年10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关于“两学”。2004年，广电总局主要领导要求中广协会编写《中国广播学》和《中国电影学》。2009年，根据中广协会领导的意见，学术委员会组织人力审读历经五年编写完毕的“两学”书稿。审读者认为“两学”书稿尚未达到“学”的基本要求，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和修改方案。目前，《中国广播学》正在重新编写。《中国电影学》如何处理，尚在研究。

此外，2008年～2010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支持下，连续举办了三届“年度广播影视学术理论研究项目”招标工作。总共批准立项60个，结项50个。2011年举办第四届，共立项23个。在浙江传媒学院支持下，批准“媒介素养研究”立项56个。

二、学术成果评选

五年来，学术委员会组织了三届广播影视学术论文和两届广播影视学术论著的评选。

从2008年6月到2012年10月，完成了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广播影视学术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作品478件。3篇获得特别奖，67篇获得一等奖，101篇获得二等奖，171篇获得三等奖。

2009年6月至2011年12月，完成第六届和第七届广播影视学术论著的评选。共收到参评著作120部。1部获得特等奖，1部获得特别奖，12部获得一等奖，22部获得二等奖，41部获得三等奖。

2009年2月9日至8月25日，经学术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广播电视台学会和中广协会上海（东部）学术研究基地主办“甲子杯”纪念新中国广播60年优秀学术征文评奖活动。共收到58篇参评论文。3篇论文获一等奖，6篇获二等奖，9篇获三等奖。

2010年3月5日至12月14日，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学会联合举办“‘上海世博杯’——世博会与有声有色的广电宣传”有奖征文活动，共收到近百篇参评论文。终评委员会经过讨论，以投票方式评选出5篇特稿，6篇获得一等奖、10篇获得二等奖、19篇获得三等奖。

另外，部分学术委员还参加了“重大突发事件和媒体应对策略”、“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广播电视”、“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广电媒体积极应对三网融合”等征文评选以及“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十年回顾展评会”的系列活动。

总的来看，五年来广播影视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其中不乏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作品。

三、广播理论人才评选

2010年3月5日至10月25日，完成了第四届“十佳百优”广播理论人才评选。参评人员多达149人，介绍材料重达几十公斤。评委会成员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材料，为了照顾到方方面面，在讨论中，反复衡量，一再调整，最后评出十佳百优人选。在组织这项经过广电总局主要领导批准的评选活动中，我们认识到评人物比评作品更加受到参评者的重视。2010年度学术年会，报名参加者竟然超过百人，人数之多成为近年来学术年会之最。

四、学术研究基地建设

五年来，学会先后成立了六个学术研究基地。华东（上海）、西部（成都）、北方（吉林）、中南（广州）学术研究基地、高校传媒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和媒介素养研究培训基地（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六个基地覆盖了全国各地，覆盖了高等院校，成为中广协会学术研究的两根强有力的支柱。

2010年和2011年，学术委员会派出考察组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学术研究基地，和各个基地成员举行座谈会，交流学术研究的经验，了解各地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专长、队伍结构、研究计划等，倾听了各地广播理论工作者对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四篇考察报告。

五、专项学术活动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广协会决定在广电系统开展“相伴成长，见证辉煌——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事件、人物、节目、栏目”评选活动。学术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参与了此项意义重大的活动。经过广泛动员、认真评选，评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影响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60件大事、60个人物、60个节目和60个栏目。在全国广电系统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3月至8月，学术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策划、协会学术部和《电视研究》编辑部联合承办了“中国电视发展最具创新力十大上星频道（2012）”评选活动。部分学术委员参加了初评、复评和终评，央视综合频道、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云南卫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纪录频道、北京卫视、湖南卫视和江西卫视入选。9月初，在广州举

行的“2012 第二届中国电视发展年会”上发布了评选结果。2013 年 4 月上旬至中旬，部分学术委员参与了“中国电视年度创新榜（2013）”（包括年度最具创新力十大上星频道和最具创新力十大上星栏目）的初评和复评。4 月 28 日，部分学术委员参加了终评。评选结果已于 5 月 22 日在第三届中国电视发展年会上公布。

六、加强自身建设

学术委员会自身建设的重点在于严格按照规章办事，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五年来，先后召开了 20 次主任会议、6 次全体会议和 5 次学术年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属于决策性质的会议。凡属重大决定、重要活动都在主任会议上讨论，作出决定，并上报协会领导审批。例如，研究、制定每年学术委员会和协会学术部的工作计划，拟定重大活动的安排以及工作人员的分工，策划重要课题，并确定人员安排、工作步骤、完成期限等。

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学术年会属于通报性质的会议。在每次会议上，学术委员会主任有责任如实、详尽地向与会人员通报上一个阶段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广播影视学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工作。

五年的工作，从实践中得到的主要体会有以下三条：

首先是永远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学术研究中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做到：立足国情，联系实际；敢说实话，敢讲实情；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知过必改。

其次是高度发扬学术民主。

在学术研究中发扬学术民主，应该做到：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身份论曲直；提倡平心静气的争论，不怕矛盾，让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不设禁区，不打棍子，事事以理服人。

再次是把学术研究切实纳入协会工作日程。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人们了解世情的深度、获得知识的途径、检索资料的速度、参与活动的范围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全国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

1997 年，我到中国广播电视台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2004 年 1 月退休，改任驻会副会长；2008 年，中广协会聘我为顾问兼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屈

指算来，到 2013 年已经在中广学会（协会）工作了十五六个年头。任职期间，得到了许许多多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和众多同行结成亲密的友好关系。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事情。在此，我对大家表示深切的感谢！

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由杨波同志担任主任，我举双手赞成。承蒙协会领导的厚爱，让我当名誉主任。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将尽个人所能敲好“边鼓”。

（作者系广电部原副部长，中广协会顾问，中广协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

目 录

永远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代序）	刘习良	1
-----------------	-----	---

文化传播与理念创新

文化的理性与自觉	张振华	3
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	王庚年	20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品牌战略	程曼丽	42
大部制 大传播 大棋局		
——署、局合并后广电传媒思维超越与战略转型	张君昌	49
论广播电视的文化张力	李易伦	60

媒体责任与内涵转变

传媒责任：时代的发展与内涵的转变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	喻国明	71
党管媒体理论的创新发展		
——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 尊重新闻规律的论述	陈富清	76
高扬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声	张小平	86
广播深层改革路径之探微	陈乾年	95

体制改革与对策调整

署、局合并迈出加快媒体融合重要一步	李新民	105
向公益传媒、公共服务回归的努力	张 聪	113
论电视频道的分类营运	李立功	121
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几点认识和实践	周 莉	132
“底气”、“灵气”加“力气”，打造文化新国企 ——以珠江电影集团实践为例	刘红兵	141

模式引进与本土改造

浙江卫视综艺节目创新实践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胡瑞庭	153
从“模仿移植”走向“超越原创” ——例析国外模式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升级	张君昌	162
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创建与创新	陆 地	173
抵制电视低俗化的现实路径	时统宇	182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发展变奏曲	俞 虹	193

科技进步与三网融合

走中国特色三网融合之路	陶世明	201
关于我国广电网络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李新民	206
积极迎接传媒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杜百川	216

历史回望与趋向观察

论新中国六十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	黄 勇	225
对新世纪十年中国广播电视的观察思考	王云鹏	234
关于中国早期“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开播时间的个人意见	赵玉明	240

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 ——中国电视 50 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胡智锋	247
从法兰克福批判到大众文化建构 ——21 世纪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理念的嬗变和趋向	欧阳宏生	260

附 录

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 2008~2012 年学术理论研究规划	275
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工作期间编纂著作书目	281

后 记

回望 2012 展望 2013	285
-----------------	-----

文化传播与理念创新

文化的理性与自觉

张振华

2010年的一天，在北京职工之家的共享大厅里，赫然见到一幅垂挂的十米长幅，上书：“热烈欢迎参加全国特产文化节的代表”。现在被冠以文化的事与物林林总总，但“特产文化”却是首次听到，不禁心生感慨：在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文化似乎既像一头蛮牛，在东奔西突；又像一个不情愿的女郎，到处“被下嫁”。有鉴于此，我们确实应该对当前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做一点审视和反思。

一、文化发展要讲理性

《人民日报》2010年8月3日发表文章，谈当下重读《老子》的现实意义。《老子》全书不过五千言，却不仅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是世界上除《圣经》之外翻译语种最多、出版的版本最多、发行的数量最大的一本书。

《老子》何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恒定思辨、警醒和“淬火”作用。

文章说，人类社会总有些疯狂的时期，比如战争时期、动乱时期或社会转型时期，等等。在这样的时期，尤其需要《老子》那种思维品格。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看看为了金钱，各种制假贩假、坑蒙拐骗、欺诈勒索、贪赃枉法，以及在一些频发的恶性事件中对生命的冷漠、践踏甚至摧残，不能不说，当下的时代确有疯狂的一面。

北大学者夏学銮认为，当下的中国，与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十九世纪初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英国十分相似。狄更斯写道，那是一个“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大有与赤贫、天堂与地狱并存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天使与魔鬼”并存的时代。当下的中国，也具有转型时期的明显特征。比如一方面时时捷报、天天庆典，但同时又矛盾重重，且触点很多、燃点很低。就贫富差距而言，一方面中国的富豪人数全球第四、奢侈品消费位及全球第

一，但按联合国标准，中国又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社会心态来说，目前存在着群体性焦虑与怨艾。比如，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地位都有明显改善，但“弱势心态”却在更多的群体中蔓延。比如：患者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医生说自己也是弱势群体；小商小贩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但城管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群众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但一些基层官员也说自己承受各方的压力太大，也是弱势群体。夏学銮把当下的不良社会心态归纳为八种：浮躁、喧嚣、炒作、忽悠、炫富、装穷、暴戾和冷漠。还有人提到仇官心态、仇富心态、愤青心态和不确定感心态，等等。从对外的心态而言，认为中国强大了，那种傲视八方、梦回唐朝的中央帝国心态在明显滋长；但同时，历史遗留的弱国心态、悲情意识又未完全泯灭，以致总是在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自豪与自卑、自信与膨胀之间摇摆。社会心态问题已引起中央重视，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要引导和培育社会心态。这是首次把社会心态问题写进五年规划。因为对内而言，理性、健康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和谐的软性保障。而失衡、非理性的心态则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对外而言，成熟、稳健、大气、包容的大国心态乃是大国形象与气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下这种各类矛盾、各类心态交织交错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文化，包括广电文化站出来，循着《老子》的思维价值，提醒社会保持一种理性、平常心态、清醒和思辨，从而防止虚浮、狂躁、膨胀和迷失。

但纵观当今社会，无论在经济建设领域，还是在文化建设领域，狂躁心态、虚浮心态、膨胀心态似乎无处不在。

比如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据 2010 年 8 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显示，我国有 655 个城市正在计划“走向世界”；在全国 200 多个地级城市中，有 183 个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为了“走向世界”，为了成为“国际大都市”，许多城市已不满足于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喷泉，而是争着要搞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其中包括建摩天楼。据《摩天城市竞争力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在建的摩天楼达 200 多座，相当于美国摩天楼的总和。而 5 年后将达 800 座，会是美国的 4 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城市光鲜耀眼的地面建筑的地下却是落后的排水设施，结果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今年北京、广州、成都、武汉、长沙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以致有人说，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先从下水道做起吧！”由于地面建筑是显性成绩，地下设施是隐性成绩，所以不少地方在城市建设上重上轻下、重表轻里。雨果把下水道称作“城市的良心”，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就在这个口号叫遍全国的前前后后，“楼倒倒”、“楼脆脆”、“楼大火”接连发生。所以有人说：“城市，应该首先让我们更

安全。”

还有，全国有 40 个城市要建中央商务区（CBD）。其实，最早提出 CBD 概念的美国，至今也只在纽约和芝加哥建了两个 CBD，占地不过一平方公里，但我们有的 CBD 居然要占地十几甚至几十平方公里。这既是大手笔，但也蕴藏着大风险。一旦无人进驻，将是大包袱。

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但符合北京身份的城市禀赋、城市底色到底应该是什么？新华社 2011 年 11 月 29 日报道，北京现代汽车三厂头一天在顺义动工，年产汽车 100 万辆。在传统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特别是北京已经成为“堵城”的情况下，为啥还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呢？所以有专家说，北京完全没有必要为不是经济特大型城市而苦恼，完全没有必要追求“肌肉男”的那种强悍的特质躯干，北京应追求成为“头脑引领型城市”。

北京作为首都，应该说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上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但据北京社科院编写的《北京城乡发展报告 2010—2011》透露，目前北京的世界城市指标总分才 34.90 分，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差距相当大。其中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是上述三城市的 1/2；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上述三城市的 1/9；而每万辆机动车死亡人数却多出了一倍。《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40 年后，即到 2050 年北京才能跻身世界城市，而前提是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北京尚如此，其他城市恐怕更是路途遥远。因此，我们应该慎定目标、慎唱高调，广播电视不要为之推波助澜，升虚火、造虚势。

雨果在谈到城市建筑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时曾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刻在石头上。的确，无论是长城还是庙宇，无论是赵州桥，还是客家土楼，都是一种凝固的文化。

当年北京迎奥运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但外国人却说他们希望看到“老北京，新奥运”。这话不无道理。想一想每届奥运会在希腊女神赫拉神庙点燃火炬的那一幕，那种历史与现实的跨时空的对接、对话是多么让人浮想联翩、怦然心动。然而，“老北京”与“新奥运”的对话已几无可能，因为除了中轴线上的建筑，“老北京”几乎已踪影难寻。

外国人几代住一所房子，而中国人一代可能翻盖几次房子。《环球时报》说，在英国，“老公寓比新公寓值钱，茅草屋居然成了伦敦人的骄傲。住老房子，英国人觉得有面子。”而现在的中国，一提城市建设，就意味着大拆大建，搞“大小变”工程，于是，“一年一小变，两年一中变，三年一大变”成了一些城市既让人激动、又让人心颤的口号，以致从 2007 年～2010 年，西湖边的最高建筑——浙大三号教学楼、号称亚洲最大跨度的建筑——沈阳夏宫、

南昌地标建筑——五湖大酒店等先后被拆除。

尽管这些建筑当年施工时都悬挂着“百年大计”的标语，但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不过 20 年，最短的只有 13 年。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中国既是每年新建筑最多的国家，又是世界建筑寿命最短的国家，平均寿命不过 30 年。”

2011 年 6 月 24 日，《人民日报》在“金台论道”栏目发表评论《城市，要为历史做加法》。文章说，香港观塘需要拆迁重建，一棵有 40 年树龄的榕树挡住了去路，结果花了很大力气移栽到了隔壁公园里；相反，南京为了修地铁，居然砍掉了民国时期栽下的古树，引起市民的强烈不满。

与此相类似，北宋粮仓、唐代古城、一座座名人故居，虽然躲过了一次次的战乱、地震、洪水，却躲不过今天的推土机。

文章说，城市绝不仅仅是各类现代建筑的集合体，它更应有自己历史的机理、文化性格；城市当然要发展、要建设，但是无论如何建设，必须做加法。

本文讲的是“文化的理性与自觉”，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呢？因为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虽然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文化对于经济的引领、提升和支撑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与经济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比如上述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的种种冲动、盲动和顾表不顾里，说到底是文化思维落后的表现。

如果再举个例子。比如日本，在 20 世纪工业化初期，也曾只顾赚钱而不顾信誉和产品质量。我的中学物理老师讲，当年买过一条日本布料的裤子，忽然天降大雨，等他穿着这条裤子从故宫北门走到南门，长裤变成了短裤；六七十年代，日本为了尽快从二战的废墟中走出来，也只顾发展经济和物质扩张，结果被人称为“经济动物”。后来日本醒过神来，大力发展文化，于是电视剧出现了《阿信》，动漫则享誉全球，以致哆啦 A 梦成了日本的形象大使。欧洲一些青年对日本有好感，就是从少年时代看日本动画片开始的。

现在，虽然没有人把中国称之为“经济动物”，但是如果看看这些年出现的毒酒、毒米、毒奶粉、毒豆芽、染色馒头、地沟油、潲水猪，以及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这不都是只顾赚钱，不顾人的死活的“经济动物”的表现么？

问题出在物质产品上，根却在道德、诚信、法制等文化层面、文明层面。因此可以说，在相当意义上，文化是经济的底色、是经济的灵魂。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是文化，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还是文化。

这就决定了，文化，包括广电文化，在推动经济的科学发展、规范各种